

2021.10.20 CHINA FILM NEWS 中国电影报

责编:赵丽 责校:张惠 美编:李骁 E-mail:zgdyb2004@126.com

再忆“李行大哥”

■文/张思涛

李行导演已经走了。我写了一篇《怀念“李行大哥”》，其中写到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我说，2020年以后疫情笼罩世界，他没有再来大陆，我们也没有再见过面。

实际这两年我和李行大哥虽然没有再见面，却通过电话，有过几次难忘的交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一直宅居在家。活动少了，时间多了，我想起2005年我和李导演有过一次对话录音，一直没有时间整理，现在有空正好来做这件事。

我拿出珍藏十五年的两盘录音带，断断续续花了两周时间，整理出一篇《对话：海峡两岸电影交流的回忆》，两万多字。

说起那次“对话”，需要提到国家广电总局2005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电影一百周年国际论坛”。为了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主办方在论坛开幕式上特意安排了吴贻弓、李行、吴思远三位导演分别代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电影界作主题发言。这自1949年以来还是第一次。

李行导演在发言中强调：“台湾电影是中国电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电影的成长历史，与大陆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台湾电影有着与大陆电影“一脉相承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这是“一个无法抹杀的事实”。他在发言中向“海峡两岸三地”的同行们发出呼吁：“在国家统一以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进一步两岸的电影也应该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全体电影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李导演发完言，我立即上前向他表示热烈祝贺，一为大会对他的重视和安排，二为他发言的精彩和深刻。同时我向他建议，当晚我俩进行一次对话，共同回忆一下自1990年他首访大陆以来，我们经历的“两岸电影交流”那些事情。他欣然同意了。

那天晚饭后，就在李导演下榻的北京新大都饭店1504房间，我俩进行了一次长达四个多小时的聊天式“对话”，我作了全程录音。

现在，终于把这份录音整理出来了。我马上和台北通电话，请李行导演亲自校改我的整理稿。我说，记下这段历史对于今后了解两岸电影关系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他同意我的意见，要我把电子稿发给他的助理吴国庆，再转给他。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吴国庆给我打电话，说李导演已经把稿子校改好了，并已发回我的信箱，还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打开信箱，发现李导演改过的稿子有十五六

处之多，在一些地方还用红笔仔细改正了我的“错字”。比如，有一处提到国家广电总局总编室的邹士明女士，她本是我的老大姐，我们相识有三十多年了，但是我习惯把她的名字写成“邹士民”，反而倒要李导演来改错；还有一处提到李导演1990年首访北京时说过的一句话：“我承诺邀请大家去台湾，做到你能来我能往，这才是交流”，李导演特意把“你能来我能往”改为“我能来你能往”，因为当时他已经来大陆了，而大陆电影界还没有人去過台湾，这样改显然更贴近实际情况。李导演的有些修改虽然很细小，但充分显示了他做事的认真和仔细。

李导演附给我一封信，信中说：“思涛：已读完了，又用了两天时间来改错字。今让吴国庆快传送给你。问题是将来刊登在何处？台北，比较困难。大家想想看。……”

从李导演的短信中，我感觉到他心中的忧虑。“台北，比较困难”。可能当时在台湾难以发表一篇记述“两岸电影交流”的文章。那么，北京呢？我也有些担心，因为这两年“两岸电影交流”好像有点“冷”了。

我找到《当代电影》主编H先生，他看了，很愉快：“没问题，我们马上发。”而且他一再向我表示感谢：“把这么重要的文章给了我们。我没有感到他是在客套，两个当事人本人的回忆，应该是篇重要的文章呀。

《对话》很快在《当代电影》杂志发表了，杂志社直接给李导演寄去样刊。李导演收到样刊后给我打来电话，说这本刊物他要送到台湾电影资料馆作为历史资料保存，还要送给需要了解两岸交流的朋友和有关机构，因此寄他的样刊肯定不够用。我说，没有问题，还要多少本，统计好了告诉我，我朝杂志社去要就是。

整理发表《对话》以后，我又想到一件事。近两年来我一直想编一本书，把自己和周围朋友亲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两岸电影交流的一些文章编纂起来，书名拟叫《见证海峡两岸电影交流三十年》。这时我想，应该把上面这篇《对话》收入，另外如果能请李导演能为这本书写一篇“前言”，那就太好了！

前两次通电话，我发觉李导演现在听力不好，为了把我的请求说清楚，我特意写了一封短信，微信传给吴国庆，请他转交李导演。我在信中对李行大哥说：“……我正在编一本书，准备收录我俩的这篇《对话》，还有你2005年在北京纪念大会上的演讲，还有我的几篇论文和回忆

录，以及我对林清介、王清华、熊焦屏、梁良等几位台湾朋友的访谈文章，还专门请人写了几篇文章，大概会有30多万字，再加上我手头的许多照片资料。我想，这也是一段历史，是中国当代电影史上的一段重要历史，应该纪录下来。……十分希望您能为这本书写一篇前言。不知您的时间和健康状况是否允许？短些也无妨呀！十分期待！……”

微信发出以后，心中有点忐忑。李导演九十周岁了，他还能为我写这篇“前言”吗？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吴国庆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张先生，李导演要和你讲话。”

手机里响起了李导演的声音，他说：“思涛，我年纪大了，最近身体不大好，写文章不行了。……我讲一下，你帮我写下来，再发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李导演声音亲切而又有点苍老，他似乎没有多加思索，即兴地跟我讲了一段话：“……是你第一个请我到大陆来。陪我在北京，还到了西安、到了上海。领我去见夏衍。捐献了我的三部电影。还做了许多事情。……这些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是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非常感谢你。……我为什么要搞两岸电影的交流？因为如果没有台湾电影，还能叫完整的中国电影吗？……程季华是研究中国电影史的权威，我问过他，他表示台湾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两岸电影交流也是中国电影史的重要一部分，这就是历史，要记载下来，否则以后的人就不知道了。我认同你的这点看法。……你现在退休了，有时间，由你来整理、记录下这段历史是最合适的。不能忘了这段历史。……我们所以交了三十多年的朋友。……”我一边听一边匆匆地在一张纸上作了纪录。

那时已经到了2021年的春天。我曾经几次拿着李导演的这张“电话记录”，坐在书桌前，考虑如何为他代笔起草一篇“前言”。我想，李导演对我讲的是一通大白话，其中的意思很明白，条理也清楚，但是，我总想怎么能再作些提炼、阐述和修饰，使这篇“前言”更精彩、更深刻些，又不偏离李导演的语气和身份。有些事情，考虑太多，就做不成了。没有想到，突然传来李导演“走了”的消息。

说“突然”，因为在我印象中李行大哥一直还是那样健康、乐观，笑呵呵的样子。他最后没能看到我代他起草的那篇“前言”，成了我的一个遗憾，也是我欠大哥的一笔“债”。……

（写于2021年9月8日，台北举行“李行导演追思仪礼”之日）

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红色电影忆党史 农影精神践初心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心向党’农村电影公益展映活动”为主线，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相结合，立足行业实际、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开展相关活动。下辖529个放映队以观影群众所思所盼为努力方向，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工作，以实实在在的观影成效让群众分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共享优质红色影片。在此期间，源源不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基层典型放映员……

宕昌放映员王学贵：不忘初心，爱岗敬业

自1985年6月踏上电影放映的道路，宕昌县放映员王学贵就一直坚守着“为群众带去文化娱乐”的信念，默默地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在农村电影事业中。作为一名放映员，王学贵牢记自己的宗旨使命，把服务群众作为目标，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除了正常的放映任务外，他常年走村宣传党的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党的强农惠农政策、农业科技知识、畜禽养殖技术、疾病预防常识等。在群众中大力开展红色电影传播和党的政策方针宣传，切实提高了群众对党史学习认知和各项国家助农相关政策知晓率。

2021年，在王学贵的带领下，宕昌县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作站积极响应开展“红心向党”农村电影公益展映活动”，组织党员群众观看经典优秀的红色电影，学习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在进一步丰富和活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持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做深做实。截至目前，王学贵在全县18个行政村、9所学校、3个社区等多处放映点开展放映活动，将红色电影带入乡镇、社区、学校、福利院等地，让2万余群众在家门口学党史、知党事、共党情。通过一帧一帧的画面，党员群众在光影中铭记党的光辉历史，感悟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让红色基因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王学贵心怀大爱，以35年执着的信念，跋山涉水，足迹遍及宕昌县每一个角落，不停奔波为乡亲们放映电影。用一方银幕，为千家万户送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农村电影事业，献给了全县农村的精神文化建设。他带领的19个农村电影放映队，曾被国家主管部门评为“先进集体”；被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评为“先进单位”；连续两届被评为“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他个人多次获得省、市、县级的表彰奖励。2019年9月被县委县政府评为“最美宕昌人”。

武山放映员李改成：多才多艺，甘于奉献

李改成是武山县洛门镇蓼阳村人，优秀共产党员，武山县政协委员，“奉献武山·十大杰出人物”。他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山旋鼓舞的传承人，能歌善舞的他一直认为“农村要奔小康，不仅经济要富裕，文化思想也要跟得上”。退伍回乡后，李改成将自家的庄院改建成村里的文化大院，平时和乡亲们一起唱歌跳舞，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2003年，为进一步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李改成自费购置了电影放映机，学习放映技术，开始义务为蓼阳及周边村庄农民免费放映电影。面对家人朋友的质疑和不解，他说：“因为条件所限，当地农民有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到一场电影和一场演出，是党的富民政策让我们过上了今天的好日子，我不仅要通过放映宣传好政策，也要让老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起来。”为了吸引十里八乡的群众来看电影，他将露天电

时教旅思宽

——怀念李前宽主席

■文/郝 瑾

秋雨淅淅沥沥，凭添几分愁苦。愁苦必是叠加的，内心的感伤浮现上来。李前宽主席走了，朋友圈里凭吊“刷屏”，而我多了挥之不去的歉意。

初识李主席，是在2009年10月，江西南昌。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晚会之后，他手持红酒杯，来到我们中间，兴奋地说，这丫头的获奖感言，精彩。

那一年，我的纪录电影处女作获得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因为获奖感言，一个初出茅庐的纪录电影导演，得到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前宽先生的肯定，继而结识了他和肖桂云这对影坛伉俪。

李前宽、肖桂云夫妇，联合执导《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七七事变》等影片，囊括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等诸多大奖。

2010年，作为中国电影家代表团成员的我随团访美，听到了李导夫妇自己讲自己的故事。“结婚给的屋子挺大，是个地窖子，墙上到处是虫子，一粘盐就能化了。后来转到另一间屋子，9.6平米。”

“我们从电影学院毕业分到长影，最好的青春年华是在斗争中，阅历可以去掉十年，但年龄去不了。”

“当一个场记幸福得不得了。那时电影界四部片子，长影三部，我俩一人担任一部电影的场记，太幸福了，接触到专业了。”

辗转的大巴车里，一片欢声笑语。

谈笑风生，想起李主席，一定有他的音容和笑貌。

2011年，我陷入泥淖。长期白天中国事务夜晚欧洲外联的时差碰撞、导演角色

与投资公司的管理碰撞、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佐之哲学与人物本身的高难度，我拜访李导夫妇求解。

“对青年导演的爱护、对青年导演的扶持……”

解，来自题外，带着温暖。老导演、协会主席，双重身份的他，在大开大合的言谈中，传递着理解、关爱及至呼唤。

唯一往无前，解万难。

2013年，电影节期间我去看台湾纪录片，巧遇李前宽主席，映后座谈还见到了台湾的李行导演。李行导演说，你们都是纪录片导演，要多交流啊。他开创了台湾电影的“健康写实主义”，更被誉为“两岸影人交流第一人”。两位李导都致力于两岸电影文化交流，创办“两岸影展”。

2021年8月12日，李前宽导演西去。一周后，8月19日，李行导演辞世。那是怎样的友谊与追思！

时光流逝。2018年我筹备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影片时，自然而然想到李主席，他在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期间，积极推动与台港澳的电影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助理介绍李主席要外出治疗，身体有恙。

而见到李主席时，他一如往日的潇洒，没有言谈疾病，也没有病态。澳门，妈祖庙、玫瑰教堂，要体现出文化的包容、和谐……院子里，李主席一边走着一边与我说着，间或同肖老师抱着探枝叶的外孙女打个招呼。回到工作室，他翻找名片，打了多个电话，希望支持这部澳门题材的影片。

2019年，李主席安排助理找我，他想做

一部关于新中国电影诞生的纪录片，让我担任导演。次年，李主席工作室，他略带兴奋地跟我说这是一部纪实性史诗大片，1945年接管“满映”，1946年金山成立长春电影制片厂，1947年张瑞芳协助金山创作《松花江上》……

他说他再改改本子立项。只是一个导演的我，或只有等待启动，没有更多能耐去推动这么有意义的片子，去实践一位老人一而再希望我实现的事情。

如今，斯人已逝，理想升腾，空留那剧本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报架里：

《东方欲晓》
谨以此片献给新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们
编剧：李前宽 ……

追忆落稿，与肖桂云导演通话核实一些具体细节，肖老师深情地谈起了李导：“他家人天生能喝酒、会抽烟。但他不抽烟也不怎么喝酒。别人以为我管得严。其实是他心思不在这儿，他觉得太耽误时间了。”

“2014年得病，或许只有半年的时间了。到后来，八个年头七年整，他一直在积极地干事情，他说我不能等死啊。”

“没有说过一次身后的事。”

我为什么不问呢？
可我怎么能问呢？”

……
（作者为国家一级导演，2021年10月10日追忆）